

美国高等教育“三A”原则及其对 重构中国大学精神的启示

魏世平,卓光俊

(重庆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重构中国大学精神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大课题。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三A”原则一脉相承,继承发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三A”原则,并由此审视中国大学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重构关键在于实现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坚持民族文化的自强、自立。

关键词:“三A”原则;重构;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5-0139-04

大学精神是大学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大学文化的核心、精髓,反映了大学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格。大学精神是一种弥散状的存在,可充溢和体现于大学的每一微小的组成之中^[1]。大学精神决定了大学的基本信念、基本原则,指引着大学发展的方向。

一、美国高等教育“三A”原则的精神内核

一直以来,在有公信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学无一能进入前200位。而美国在全球大学前200强中占1/3以上。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建国到现在只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的高等教育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超越欧洲,一举执世界学术水平之牛耳,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倡导的“三A”原则。“三A原则”是美国大学尤其是美国一流大学最重要的精神基石,其基本内涵包括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美国高等教育成功与其“三A原则”息息相关,“三A原则”中的“学术自治”保证了教授治校,高度自治,理顺了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使高校的管理不受外界干扰;“学术自由和学术中立”保证了学者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不会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受到约束,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的原则。“三A原则”还体现了深深扎根于美国本土的民族精神,即独立、平等、自由的美国文化。

(一) 学术自治

学术自治是指:“为社会公益着想,政府应尽量避免干预大学事务(紧急情况除外),大学有权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2]即作为独立法人机构的大学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办学目标,并在付

收稿日期:2008-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责任与对话:学校道德教育的现代性思考”(CEA070192)

作者简介:魏世平(1971-),男,四川绵阳人,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学研究;卓光俊(1966-),女,四川自贡人,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诸实施的过程中不受到政府、教会的干预。学术自治又称大学自治,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惯例。欧洲中世纪大学自治的传统移植到美国,再经过19世纪末洪堡精神的洗礼,学术自治的精神得以扎根于美国大学文化的土壤中。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自治的范围包括:(1)指定资金使用于特殊之目的;(2)支出费用仅受审计上的监督;(3)决定大学雇员的分配、工作分担、薪资及升迁;(4)选择教师、行政人员及学生;(5)建立有关等级、学位授予、开设课程及发展计划上的学术政策;(6)研修有关学术自由、成长比率以及研究和服务活动的行政之政策^[3]。

(二)学术自由

19世纪初威廉·洪堡(William Von Humboldt)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出了“学术自由观念是大学的核心”的思想。洪堡对学术自由的内涵作了如下阐释:“教师在专业上享有自由探讨、发现、出版,教授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所发现的真理,并且这种自由不受任何的限制,也不听从任何权威的指挥。任何主旨的政党的和舆论不得加以干涉……这就是学术自由。”^[4]19世纪末大批留学德国的美国学者把学术自由的思想带回了北美大陆,使之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同时,大学教育的人性化、世俗化,以及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都促进了学术自由思想的发展。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保守主义者担心学者们的一些过激言论和文章会破坏社会安定,开始遏止学术自由。许多学者因发表了与官方意见不合的言论和著作,而被大学解雇或者受到起诉。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最终促成了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立。1915年1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正式成立,会上选举约翰·杜威为第一任主席,并提出了著名的《原则宣言》。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5]。对于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除非玩忽职守或体力脑力无法胜任其职,学校不得轻易解雇。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学院协会”联合发表《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关于学术自由,《声明》指出: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于公共利益。学术自由存在的全部根据是:大学是为公共利益而存在的,而不是为满足教师个人及大学的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保障有赖于真理的自由探索与自由展示。学术自由不是学者个人的自由言论事务,也不是大学教师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而是让大学教师凭借对学术自由权利的拥有对社会做出贡献。学术自由是确保大学及学者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整体利益的根本保证^[6]。《声明》指出:“终身教职是保证大学教师教学、研究以及校外活动自由的手段;大学终身教职所提供的充分的经济安全感,使学术职业对具有学术

才能的人士产生吸引力。”^[7]

(三)学术中立

学术中立原则是在1915年AAUP提出学术自由原则以后,为了防止大学教授因政治原因而遭董事会解聘,由杜威和洛夫乔伊等人追加的。学术中立是一个妥协条款,要求教授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界,对外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主要是指学术探讨对有争议的问题采取中立态度,不介入一些社会问题的是非争议中,教授在教授有争议的问题时,应尽量避免掺入个人的观点,从而尽可能保持一种价值中立,使学术研究得以排除所有的主观感情色彩而保证其对追求真理、尊重事实的学术精神。

学术自治是指大学的学术管理事务由学者自行管理,教授治校,不受官方的行政干预。学术自由是自由的一种,它是根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学术自由的基本意义,是指大学(或其他高等学府)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职之恐惧的自由^[8]。学术中立则是一个为保护教授而制定的妥协原则,要求教授对敏感的社会问题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三A”原则所体现的美国大学精神孕育、熔铸于与社会团体、宗教派系的持续斗争之中,同时也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精神脊梁——独立、创造、批判、开拓和理想主义。美国大学的“三A”原则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性格,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保证了学者教授能够潜心学术研究,贡献学术成果,更好地为科研和教学服务,这也是美国大学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超越欧洲成为世界学术水平之翘楚的重要原因。

二、“三A”原则与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大学精神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中国大学经历了向欧洲、美国和前苏联的学习过程,前期受欧洲和美国的影响较大,建国后主要套用苏联的办学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中国大学精神也受到多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但是蔡元培时代的中国大学精神却与美国大学的“三A原则”一脉相承,两者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和精神内核。

其一,美国大学“三A原则”中的学术自治与当年北大在学术管理问题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同出一辙。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话厘清了大学与政治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和传授知识的圣地,因此,大学的一切学术活动就应该摆脱政治的干预,并以此作为学术自治的重要基础。为了尽量达到大学自治的目的,蔡元培从以下三个途径来削弱政治对大学的干预:第一,蔡元培用他个人极为特殊的地位为北大争取相当程度的自治权;第二,在北大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第三,进一步在外部制度上确保大学自治。蔡元培以及后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都对捍卫大学的自由与独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其二,美国大学“三A原则”中的学术自由与当年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殊途同归。中国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教育主导思想,基本上处于一种封建专制状态。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努力形成“各行其是,并不相妨”的学术氛围。北大讲坛上新派与旧派学术团体并存,各种学术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繁殖在这个兼容并包的学术大熔炉中。美国大学为保护学术自由而采取了终身教职,当年的北大已经初步具备终身教职的聘任体制。北大当年只对三类人予以解聘:第一,一批不学无术、在北大蒙事的外国教员;第二,一批不学有术、在北大兼职的中国官僚;第三,个别学问和人品都极差、影响极坏的专任教师。而对于尽心尽责的教师,为了保证其安心工作,通常在第二年获得续聘以后即可获得终身教职^[9]。

其三,美国大学“三A原则”中的学术中立是要求教授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界,对外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当年的北大处于国家和民族的动荡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在中国萌芽,北大成为了马列主义的主要策源地之一。由于北洋政府的扼杀,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播种者的作用,蔡元培虽然多次采取激进的手段保护学者们的言论自由,也不得不在教授们的学术活动中做出一些限制,这是出于保护学者们而不得不采取的妥协作法。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下,北京大学云集了一大批的学术大师,新派的有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旧派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北大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兼容并包的自由风格,开放进取的创新精神,培育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一代教育新风气。北大精神树立了现代中国大学精神之典范,北大精神也成为中国大学精神的杰出代表。

三、借鉴美国高等教育“三A原则”,重构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历经坎坷,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2005年,中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在短期办学利益的驱使下,高校规模盲目扩大,各类高校纷纷兴起。中国大学在呈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同时却难以掩饰繁荣下的重重危机。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官本位盛行、学术腐败、学历泡沫的膨胀使高等教育偏离了追求真、善、美的轨道。大学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重塑大学精神,回归大学本原”已成为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

醒思中国大学精神的失落,重拾北大精神,继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坚持民族文化的自强、自立,已成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研究

美国大学的“三A原则”,审视美国高等教育的精神、理念、信仰对重构中国大学精神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

第一,中国当代大学制度设计的理性回归。1927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10]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多次提到,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反观近年来中国大学的现状,大学行政管理者在学术管理事务中渗透了大量的权力,严重影响了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阻碍了大学的健康发展。“我国大学在产生之初就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政府官员直接管理大学,未能为学术人员参与学校管理留有余地。加之建国初期受高度集权的苏式政体影响,大学内部的行政组织不过是政府机构的延伸,大学的行政权力也只是政府权力的延伸,大学的行政权力因此而膨胀。是故,我国大学的内部管理基本上是靠行政权力来进行的,学术权力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实践证明,大学的行政主导模式不利于学术自由,阻碍了学术进步。而以学术主导的模式管理大学则有利于学术自由和学术的发展。学校内部要适当分权,除大政方针、重大问题外,学术事务应尽可能交给学术人员去处理,学术管理的权力应尽可能赋予教师群体。”^[11]

第二,本土情节与世界胸怀的结合。胡适在1947年任北大校长期间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学术独立的含义包括:(1)中国自己的大学可以担负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而不必到国外寻求;(2)受过基本训练的人才可以在国内大学做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国内可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和机构帮助解决;其四,中国学人可以与世界学人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该计划尽显中国大学独立之气象、宏大之精神。反观中国大学近年来的现状,各高校唯海归是尊,但凡是海归学者,都予以重视和优待。但相当部分海归派学者的付出与产出却与大学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本土情节与世界胸怀的关系。虽然中国近代大学在制度上具有鲜明的移植性,但中西文化在发展道路上有着较大差异,移植的目标最后要落在“自强”上,因此大学作为国家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就必须考虑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培植文化自主性,避免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

对西方大学文化、精神的学习应当以中国文化的昌明为本位。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回归到一种源自兼容且具有兼容特性的文化精神。中国大学应该保持独立自主之精神,兼之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度学习西方一流大学之精华,做到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提倡的“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否则将如胡适所言,“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

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第三,重塑中国大学的社会使命感。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是19世纪下半叶的“学者之家”或20世纪上半叶的“服务站”意义上的大学,它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是传承和弘扬文化的中心,是社会主流思想传播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产出的中心。大学产出的一切理论成果、实践成果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服务于民族的进步、服务于社会的创新,因此现代大学必须承担明确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然而,在现有行政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的框架下,尤其是在现期消费诉求与利益刚性增长的社会环境中,大学教育相当程度地存在着实用主义的倾向,学术研究泡沫化的倾向日益明显^[12]。大量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空而虚的状态,富有创新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鲜见于世,难以承担服务国家、振导社会的重任。

当代中国大学应树立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具有“自强不息,不甘人后”视民族兴亡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当代中国大学经历着市场化的冲击,面临过多权力和资本的干预,但外部环境的恶劣不应成为当代中国大学不思进取的理由。清华大学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历经磨难,备尝艰险,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始终自强不息,不甘人后,创造出了辉煌的成绩,清华人的个人意识和民族意识总是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解放的独特道路^[9]。

中国大学自立、自强之路艰辛而漫长。重构中国大学精神,努力实现中国大学的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孕育自立、自强的大学文化品格已成为当代中国

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我们翘首以盼一个新的蔡元培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 [1] 储朝晖. 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中西大学的心灵差异[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6(1):102.
- [2] MICHAEL A. Olivas: The law and Higher Education[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9: 133 - 134.
- [3] 周志宏. 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 台北: 蔚理法律出版社, 1989: 121.
- [4] 陈列, 俞天红. 西方学术自由评析[J]. 高等教育研究, 1994(1):100.
- [5]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 徐小洲, 陈军,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5.
- [6] 王保星. 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的关系[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5, 3(1): 82.
- [7] LOUIS JOUTHINETAL.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A Handbook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M]. Madison Milwauke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36 - 37.
- [8]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172 - 174.
- [9] 刘琅, 桂苓. 大学的精神[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67, 192 - 193.
- [10] 张岱年. 我与北大[N]. 光明日报, 1998 - 02 - 28.
- [11] 周光礼. 学术自由与大学管理[J]. 机械工业高教研究[J], 2001: 1, 10 - 11.
- [12] 潘自勉. 论现代大学精神之重建[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7(04): 18.

The Enlightenment of “Three A” Principle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Reconstructing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WEI Shi-ping, ZHUO Guang-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Present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a hot issue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Peking university “ideological freedom and compatibility with all trends of thought” put forward by Cai Yuanpei inherits “Three A” principle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heriting, developing the spirit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learn “Three A” principle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make an enlightenment point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key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lie in the realization of academic freedom, academic autonomy and persistence of self-independence and self-renewal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ree A” principles; reconstruction; university spirit

(责任编辑 彭建国)